

DOI: 10.3969/j.issn.1672-1101.2025.05.008

动员与博弈：抗战时期的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

孙 功

(安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整合全国力量,号召建立各级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于1938年2月应运而生,成为战时安徽实施民众动员的核心机构。安徽省动委会的诞生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氛围、新桂系主政安徽后巩固统治的现实需求以及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等多重因素交织的产物,其独特的组织结构构建了一个覆盖全省、深入基层的动员网络,在后勤支援、抗战宣传、情报搜集、妇女动员等方面开展了广泛工作,对支撑安徽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国共摩擦加剧和新桂系政策转向,安徽省动委会经历了旨在削弱中共影响的重大改组,其性质与功能发生根本转变,最终走向衰落。安徽省动委会的历史,深刻反映了战时地方治理的复杂性、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张力以及民众动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成就与局限,为理解抗战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地方政治生态提供了重要个案。

关键词:抗日战争;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民众动员;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25)05-0072-09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ynamics: The Anhui Provincial General Mobilization Committe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UN Go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full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all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obilization committees at all levels to integrate nationwide resources. In response, Anhui Provincial General Mass Mobilization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in February 1938, and became the core institution for mobilizing the people in Anhui during the war. Its emergence was the product of multiple factors: the atmosphere of KMT-CCP coopera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ar, the New Guangxi Clique's practical need to consolidate power in Anhui, and the active promotio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s uniqu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reated a province-wide mobilization network that extended deep into local communities. The committee carried out extensive work in logistical support, war propaganda,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women's mobilization,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sustaining both the frontal battlefields and guerrilla warfare behind enemy lines in Anhui. However,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friction between KMT and CCP and the policy shift of the new Guangxi clique, the Anhui Provincial Movement Committee underwent a major reorganization aimed at weake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收稿日期: 2025-08-09

作者简介: 孙功(1968-),男,安徽五河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China. Its nature and function underwent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and eventually declined. The history of the Anhui Provincial General Mass Mobilization Committee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complexity of loc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war,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mass mobilization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providing an important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and the local political ecolog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ey 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hui Province; General Mass Mobilization Committee; mass mobilization; united front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 此时有效的民众动员成为支撑长期抗战的关键。国民政府虽在中央层面设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 但真正将动员触角深入地方基层, 则有赖于各省市成立的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徽省动委会”)是其中运作时间较长、组织较为完备、活动较为活跃的典型代表。它诞生于国共第二次合作蜜月期与新桂系入主安徽的特殊政治环境, 其兴衰历程深刻嵌入战时安徽乃至华中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变迁中。学界对抗战时期民众动员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政策或特定事件, 对省级动委会这一中观层面的运作机制及其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关注相对不足。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梳理安徽省动委会的成立背景、组织架构、实际运作、内部冲突与历史影响, 揭示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整合社会力量、服务抗战大局的独特模式, 剖析战时民族主义、地方实力派诉求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 从而深化对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动员机制与地方治理经验的理解。本研究主要依据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民国时期报刊、相关人物回忆录及既有学术成果^①, 力求在实证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

一、安徽省动委会成立的多维背景

安徽省动委会的成立并非孤立事件, 而是抗战初期特定历史环境与安徽地方政治生态共同塑造的产物。其背景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剖析。

从宏观抗战背景审视, 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

全面抗战爆发, 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1935年华北事变后, 中日民族矛盾逐步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国民党民众政策也被迫随之转变。1937年2月,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迅予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以为抗战总动员之基础案》, 提出“当此国难深重之际, 欲发动整理民族之力量, 以达救亡图存之目的, 除迅即组织全国民众, 训练全国民众, 武装全国民众, 集中力量, 共赴国难, 别无他途”^{[1]444}。国民政府为应对危局, 急需整合全国人力、物力、财力, 遂于1937年8月成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 并通令各省市县成立相应的民众动员机构。这一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 为安徽省动委会的诞生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顶层框架。同时, 国共两党在民族大义下实现第二次合作, 共同抗日的政治氛围为容纳不同政治力量参与动员工作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尤其是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基层社会具有相当的感召力, 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投身救亡运动, 这股蓬勃的民间力量为动委会的运作注入了活力。此外, 安徽地处华中, 扼守长江中下游, 是连接华北、华中、华东的战略枢纽, 也是拱卫战时陪都武汉的重要屏障。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期间, 安徽成为中日军队反复争夺的战场前沿, 战事之惨烈、兵员物资消耗之巨大, 使得建立有效的后勤保障和民众支持体系成为燃眉之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长官部对安徽的动员工作也施加了直接压力。

从中观地方政治格局观察,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于1937年底主政安徽。新桂系作为

^① 学界对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徐承伦《朱蕴山与安徽动委会》(《安徽史学》1994年第2期), 童志强、周蕙《桂系主皖和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 施惠政《动员民众奋起抗日——安徽省总动员委员会始末》(《江淮文史》1995年第4期), 徐承伦《李宗仁与安徽动委会》(《党史纵览》2006年第3期), 何孔蛟《动员与控制: 抗战时期安徽国统区的民众动员》(《安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汪效驷、王鑫宏《国共关系视角下的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2期), 以及胡正定《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研究(1938—1942)》(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等。

国民党内重要的地方实力派,入主安徽是其拓展势力范围的关键一步。然而,面对日寇入侵、省内原有CC系势力盘根错节、地方行政系统效能低下等复杂局面,新桂系亟需一个能够迅速整合社会资源、贯彻其意志并区别于旧有官僚体系的新型机构,以巩固其在安徽的统治基础。安徽省动委会恰恰被新桂系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工具。一方面,动委会名义上隶属于省政府,受省主席领导,便于掌控;另一方面,其动员民众的广泛职能和相对灵活的组织形式,使其能够绕过部分陈腐的行政环节,直接联系社会各界,特别是吸收大量流亡入皖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新桂系在皖迅速打开局面、树立励精图治形象提供了平台。因此,新桂系对动委会的成立给予了积极支持,初期投入了相当的资源。1938年2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宣誓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在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提出“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在《告全省民众书》中,他呼吁全省同胞“不畏敌不轻敌,不怕官不侮官,不怕兵不轻兵”,并表示了坚决铲除贪官污吏的决心;他还发出致全省各机关电,勸以“不苟免、不苟得、不苟安”三事^{[2]5}。1938年2月安徽省动委会成立后,李宗仁亲自兼任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虑到李宗仁军务政务繁重,新桂系积极延揽了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知名人士章乃器(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担任动委会常委兼秘书,赋予其实际主持动委会日常工作的全权。这体现了新桂系投入核心人才资源、切实推动动委会运作的决心。为进一步强化动委会的地位和效能,新桂系随后又任命章乃器兼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此举不仅是对其能力的认可,也显著提升了动委会获取财政资源支持的能力。在动委会及省府各厅处的架构中,新桂系还吸纳了朱蕴山、常藩侯、沈子修、光明甫等德高望重的开明进步人士,他们均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元老,这充分展现了其整合各方力量、广泛动员民众、积极支持抗战的开放姿态和资源投入。

从微观推动力量分析,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进步力量在安徽省动委会的筹建和初期运作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首先,中共提供了明确的政治方向与理论支撑。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布抗战通电,并在洛川会议上决议放手发动群众,这为动委会的成立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基础。董必武亲赴武汉,将这一方针具体化为“开放民众运动是目前最迫切的问题”^{[3]2}的实践主张,直接击中了国

民政府片面抗战路线的要害,为动委会的组建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合法性依据。其次,中共通过派遣得力干部进行了直接的组织嵌入。长江局及地方党组织系统性地派遣了如周新民、张劲夫、狄超白等大批核心骨干。他们通过“应邀”(如周新民受朱佛定、章乃器邀请)与“推荐”(如张劲夫持冯玉祥信函)两种策略性途径,成功深入至动委会核心筹备层^{[4]105}。这些党员以非公开身份为掩护,不仅带来了成熟的群众工作经验,更在关键岗位上确保了动委会的组织架构和实际运作符合中共发动民众、武装抗战的核心目标。再者,中共卓越的统战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与凝聚作用。我党的统战工作成功动员并协同了以朱蕴山为代表的地方左派及民主人士。朱蕴山凭借其皖籍元老的特殊身份,以及与地方实力派深厚的历史渊源,将中共的政治意图转化为可操作的方案,并直接游说李宗仁等高层,最终促成了动委会的落地。这一过程完美体现了中共将自身政治主张通过统战渠道转化为各方共识的高超策略。可以说,安徽省动委会并非国民党主动为之的产物,而是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引领、自下而上进行组织建设,并通过横向统战协同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最初的构想者,更是实际的组织者和运作引擎,从而确保了这一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安徽的成功实践。

综上,安徽省动委会的成立是抗战时代洪流、国民政府动员政策、新桂系巩固皖政的现实需求以及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等多重因素复杂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是国家意志在地方的体现,也是新桂系这一特定地方政治力量借以整合资源、确立权威的工具,同时更成为中共及其同盟者等进步力量开展救亡运动的合法舞台。这种多重属性的复合,预示了其未来发展的内在张力。

二、安徽省动委会的体系构建

安徽省动委会的组织体系设计,旨在建立一个自上而下、覆盖广泛并能深入基层的动员网络,其结构呈现出层级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特点,核心包括省动委会、各级地方动委会、直属工作团、各抗敌协会以及皖南办事处等关键组成部分。

省动委会是整个动员体系的大脑和中枢。省级动委会的组织架构历经三阶段演变,核心以常委会统筹五部制为基础,兼具战时适应性与政治策略性。

依据《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省分会组织条例》，省级动委会采用“委员—常委会—职能部委”三级架构：一是委员由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代表及社会名流组成；二是委员互推 9 至 15 名常务委员，再选举主任委员总揽事务；三是常委会下设五部一室，即总务、组织、宣传、后勤、情报部及秘书室，部长由常委兼任。李宗仁时期奠定的此框架被后续主政者沿用，但职能不断调整。廖磊增设文化事业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以强化文化与妇女动员；李品仙则改组为书记长室领导五股，并将两委员会外化为独立省级机构。人事布局凸显“皖人治皖”策略，初期 11 名常委中 7 人为皖籍，四部部长朱蕴山、常恒芳等均为皖籍元老^[2]²⁴，形成“一老一壮”的年龄梯队，既借重地方威望，又注入青年活力。

各级地方动委会是组织网络的躯干，负责将省动委会的指令具体化并落实到基层。省级以下构建县、区、乡镇三级分会网络，但基层受制于经费与战乱，实效有限。县以下分会参照省级模式，采用“自上而下组建”与“自下而上补充”双轨制：一是县分会由省派指导员协助成立，委员需填报履历接受审查，旨在吸纳青年、排除劣绅；二是区、乡镇分会理论上由民众大会推选代表逐级组建，实际多依赖行政力量推动。至 1939 年 7 月，共成立区会 124 个、乡镇会 798 个，委员总计 11 906 人。然而运作面临结构性困境：一是经费短缺，县分会月费 200 元由省库拨付，但区乡镇经费依赖县财政，多数地区无法保障，致基层空有组织而无实务；二是战局冲击，1938 年徐州、合肥沦陷后江北 28 县分会瘫痪，经半年调整仅恢复 7 县，皖南 5 县始终未派指导员。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动委会跨省扩展至鄂东麻城等 4 县及豫南固始等 2 县，但人才配置高度精英化，37 名县级指导员中一半为 30 岁以下男性，且均具高等教育背景，多出身教育界^[5]¹⁷⁹⁻¹⁸²。

直属工作团是安徽省动委会深入基层的核心执行力量，其组织与运作体现了体系化、垂直化的动员网络构建。在组织架构上，直属工作团由省动委会直接组建并管辖，每团规模严格控制在 18 至 20 人，注重性别平衡以推动妇女工作，特设若干女团员。其经费保障体系完备，团员每月领取 12 元生活费，每团另有 20 至 30 元工作费及 20 元开办费，均由省会全额拨付并实行实报实销制。这一制度设计强化了省会对工作团的直接控制力，避免地方干

扰。在人员来源上，虽以省会分组织为主，但允许县分会工作团经审查合格后编入，体现了组织弹性。职能运作上，直属工作团承担宣传、组训、后勤三大任务，并深度介入地方行政。宣传方面，通过演剧、壁报等形式传播抗战信念；组训方面，组织民众团体、整编自卫队，在战区组建游击队；后勤方面，协助军队后勤并参与防奸、生产协调。除上述三大任务外，直属工作团尤为关键的是其行政辅助角色，即监督征兵公平、落实军属优待、整顿保甲制度、推动合作经济，甚至代行特种教育职责，这种政令推行者的定位，使其成为连接省政与基层的枢纽^[6]⁵⁵⁻⁵⁶。历史实践显示，直属工作团经历了动态调整以适应战局。1938 年 5 月初建 34 团，因徐州合肥失守，仅 8 县团队坚守岗位，余者溃散。省动委会遂采取双重整顿措施：一方面派专员整编原有团队，在麻埠开设干部训练班强化能力；另一方面收编太湖剧社、六安妇抗团等各地救亡团体，将直属团扩充至 40 团。整顿后，团员意志与热情显著提升，虽经验不足需团长协助，但奉献精神获民众认可。由此可见，直属工作团通过垂直管理体系、复合职能设计及战时适应性调整，构建了深入县乡的动员网络，成为安徽省动委会在基层强化政权渗透、推行抗战新政的骨干力量。

各抗敌协会是动委会组织网络的毛细血管和群众基础。抗敌协会以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为宗旨，承担动员民众、增强福利之责，其组织架构与运作呈现三重特征：一是层级化组织体系。协会按行政区划分省、县、乡（镇）三级：省级由省动委会批准设立，省党部派员组织；县乡级由动委会协助成立，名称冠以属地。会员需年满 16 岁且 30 名同职业者联合发起。权力机关为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时由理事会代行职权。理事会由 5 至 11 名理事及候补理事组成，互选 3 至 5 人任常务理事，下设书记（由国民党党部指定理事兼任）及职能股。各协会按性质分设股室，如农民、工人协会设组训、宣传、征调、救济、总务五股，妇女协会减设征调股，文化界增设研究股，形成分工明确的执行网络。二是制度化运作机制。会议制度严格：省级年会、县级半年会、乡级季会，临时会议需 2/3 会员提请；理事会月会、常务理事会周会。职权划分清晰：大会决策方针、修订会章、选举罢免理事、审核账目及会费标准；理事会执行决议、审核计划、召集会议及人事任免；常务理事处理日常会务、编拟计划、考核人员。各

股专司其职,如组训股主登记教育,征调股协办后勤,体现功能化协作。经费源于会员月费、党政补助及捐款,受理事会监管^{[5]188-194}。三是差异化发展实态。协会建立依赖工作团推动,然成效不均。1939年2月,青年协会率先成立省级组织,召开代表大会选举21名理事,推动35县建立分会,成为动员中坚。省动委会采取“青年为骨干,农民为基础”策略,以青抗带动农抗,使农抗数量居首。然整体发展受制于两大困境:其一,民众长期受压导致原有团体涣散,地方官员多存疑惧,甚至勾结势力破坏组织;其二,经费短缺严重,1938年虽制订补助办法,却因资源有限难以落实,工抗、商抗、文抗建设滞后。可见,各抗敌协会虽构建了层级清晰、分工明确的组织网络,但其运作实效受制于社会基础薄弱与资源匮乏,仅青年与农民协会借骨干策略取得局部突破,折射出战时民众动员的结构性挑战。

皖南办事处的设置反映了动委会对区域差异的关注和策略调整,其存在是动委会组织体系适应战时复杂地理政治环境的体现。皖南22县因战局扩展与地理阻隔,与安徽省动委会联络困难,故1938年4月5日省动委会第七次常务会议决议设立皖南办事处,并拟定简则,委任戴戟为主任,江擘、周世筐为副主任,初始经费200元(后增至600元)。同年5月5日,该办事处在屯溪正式成立,与4月15日设立的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协同运作,下设组织、宣传、服务三组。其核心职能是迅速指导皖南各县组建动委会、工作团及群众抗日团体,深入城乡开展动员工作。如,中共党员苏拓夫在青阳县推动成立县动委会(1938年五六月间),由县长操竹友任主任委员,爱国人士陈维稷任副主任委员;其后在杨田乡建立儿童救亡团、委托工作团及儿童话剧队,吸纳进步师生开展抗日宣传与青年培养,奠定基层动员基础。然而,因战区政治需要,该办事处于同年10月15日奉命结束,仅运作5个月零10天,改组为第三战区皖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改组后由戴戟兼任主任委员,实权由谷正纲亲信孙耀武掌控,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遭排挤,各县组织亦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及安徽省党部控制。尽管存续短暂,皖南办事处高效构建了县级动员网络,为皖南抗日民众运动提供了初期组织框架,其成果与后续国民党主导的改组形成鲜明对比。

总体而言,安徽省动委会通过省、县、区的层级

架构确立领导核心,依靠直属工作团作为深入基层的机动力量,通过各抗敌协会将民众组织化,并以皖南办事处应对特定区域挑战,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战时动员网络。这套体系在初期有效整合了官方、半官方和民间力量,突破了部分传统行政壁垒,将国家意志和抗战需求较为深入地渗透到基层社会,展现出战时地方治理的一种创新模式。然而,其运作效能高度依赖国共合作氛围和进步力量的活跃,也为其未来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三、安徽省动委会的核心工作领域

安徽省动委会成立后,围绕“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目标,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虽相互交织,但可大致归纳为后勤支援、宣传鼓动、情报搜集、妇女动员等几个关键领域,它们共同构成了动委会服务抗战大局的实践图景。

后勤工作是安徽省动委会战时动员实践的核心领域,其核心在于通过系统化社会动员保障抗战需求。在伤兵救护方面,动委会直面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通过制定《担架队组织训练规程》、普查社训队员并施以训练,紧急组建救护力量。徐州会战后每日涌入六安的百余伤兵流落街头,经动员担架队分途救护得以缓解;皖西会战中更协调驻立煌机关联合解决医药、食宿等难题,并电令沿线各县协同转运救治,展现了战时应急救护的动员效能。难民救济则体现为多层次动员体系:初期调查收容机构能力后,针对六安数万难民设立“救济难民设计委员会”,按技能分流至工厂或收容所;省府西迁后创新采用难民“以工代赈”模式,在五条交通线设立20处难民茶水站,既解决部队饮水困难又安置难民;严冬时更按籍贯分流,资遣回籍或转介工厂,形成动态管理机制。军需动员突出社会参与,如募集刀矛900余件补充民间武装,发动捐制3万余双布鞋解决将士冬寒;粮盐管理则通过普查公私存粮、组织3000民夫抢运麻城存盐,凸显资源调配的紧迫性。而坚壁清野动员彻底破坏淮南铁路及多条公路,拆除四县城垣堡;防空动员则集体挖掘防空壕、建立多级救护网络^{[5]166-170}。凡此种种,均证明后勤工作通过社会力量的精细化组织,将民众动员转化为持久抗战的坚实支撑。

宣传工作是动委会发动民众、凝聚民心、鼓舞

士气的灵魂。宣传工作的开展严格遵循抗战建国纲领和战区指导方针,并依据战争形势演变,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与任务重心。具体实践如下:第一阶段,即1938年2月至6月初,立足初创,以启蒙动员为核心任务。此阶段正值省政府迁驻立煌之前,工作重心在于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普及战时常识、鼓励兵役配合徐州作战,同时宣传抗战建国纲领及李宗仁施政方针。省分会主导了民众动员、肃清汉奸、防空、雪耻、兵役等五个主题鲜明的宣传周,综合运用口头宣讲、文字标语、戏剧歌咏等多种形式,并对敌散发日文宣传品。然而,因动员力量薄弱且县分会初建人事摩擦多,工作多集中于城市,乡村覆盖面严重不足。新成立的34个直属工作团虽努力将宣传向乡村推进,但因徐州撤退引发的皖北、皖中局势动荡,部分工作团被迫后撤,影响了淮北地区的宣传成效。第二阶段,即1938年6月初至10月下旬,因应大别山激战与严峻局势,工作中心转向以组织建设为核心的务实宣传。面对战局恶化、省府迁立煌的现实,宣传工作首要任务转为发动民众武装、组织农民、安定后方及慰劳前线。广泛群众性宣传被摒弃,代之以分散的“家庭访问”作为核心方式。工作团员深入农户,结合军事形势讲解“抗战保家”道理,引导农民通过农抗协会组织合理出钱出力并武装自卫。省分会虽也分发了漫画、剧本等宣传品并组织流动展览,但客观上面临战事阻隔、人员伤亡、印刷困难等制约。尽管如此,此阶段锻炼了队伍,加深了民众对抗战的认识。第三阶段,即廖磊主皖后,配合基层政治改革,宣传走向系统化与深化。随着局势趋稳,工作目标调整为配合行政推行基层改革,并反击日伪政治阴谋。宣传方式回归组织化的主题“宣传周”,如新年长期抗战、“一·二八”施政纲领、“三·一二”五中全会精神等,内容更具体深入,如保甲制、兵役、春耕。省分会强化领导,具体表现为:统一制定30条基本标语;每周发布宣传要点与时事分析;改进刊物;增加漫画、识字课本印发;成立戏剧研究会、标语队,提升文艺宣传的专业性与覆盖面。工作团及各级组织在环境好转后更为活跃,利用收复区日寇暴行实例,恢复地方报纸并结合组织发展深化宣传效果,推动拆除碉堡、清查户口、干部训练等实际工作^{[5]156-159}。可见,安徽省动委会的宣传工作紧密围绕军事政治形势变化,经历了从城市启蒙动员,到战时深入组织宣传,再到配合行政

的系统深化三个阶段。其始终以抗战建国纲领为最高原则,灵活调整策略与方式,虽受环境与资源制约,但在提升民众认识、配合军事行动、推动组织建设及基层改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是战时动员不可或缺的实践环节。

情报工作是动委会在特殊环境下承担的一项重要辅助性军事任务。安徽省动委会的情报工作是在日军间谍活动无孔不入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核心方针强调动员民众构建广泛谍报网的必要性。若仅依赖军政系统的少数专业谍探则真相难明,收效甚微,而发动农民、工人、商人等普通民众参与,形成覆盖城乡乃至妓院、旅馆的侦查网络,方能全面掌握敌军的兵力部署、粮秣运输及汉奸活动。具体工作内容被细化为八项任务^{[5]302},除侦查沦陷区敌伪军事政治动态、汉奸潜伏活动、匪患骚扰等传统谍报范畴外,更延伸至调查官吏贪腐、驻军纪律、民众生活状况、仇货毒品贩卖等社会层面,虽部分超出谍报范围,但为服务抗战大局仍被纳入。情报工作的实践路径体现为组织化建设与训练:一方面,情报部保送学员至皖干训班谍报组受训,两期70余人,分派至各县动委会及工作团;另一方面,强制要求各级动委会、工作团均设立情报部,并依托民众团体构建情报传递网络。为保障行动效力,还协调省政府颁发“军警调动证”以便快速逮捕汉奸土匪,同时规定各县每周至少报送两则情报,违者予以书面警斥。然而,多重困境严重制约成效。首先是民众误解情报工作“发人隐私”,导致情报人员身份暴露且遭排斥,汉奸反借机中伤;其次受限于省动委会财力人力匮乏,干部缺乏经验且训练计划因经费中断;最后是情报员自身忽视社会化掩护,技术僵化且情绪易受挫折,致使工作每况愈下。这些结构性矛盾最终导致多数规定实行者甚少,暴露出战时群众性情报体系在理想设计与现实执行间的巨大落差。

妇女工作是动委会工作中极具开创性和成效的领域。安徽省动委会通过系统化组织建设与战时动员,将妇女工作纳入抗战核心体系。首先,建立统一领导机构,通令各县动委会设立妇女组(共29县),并推动成立县妇女抗敌协会(备案21县),颁布组织大纲统一名称与工作步调,扭转此前妇女组织孤立零散的局面。其次,强化教育与训练。依据战时纲领普及妇女教育,设立识字班(岳西县107个班近4000人参训)、农村干部训练班(舒城训练60名干

部)及壮丁训练(舒城 964 人),并动员妇女参加保甲训练。最后,深化抗战实践。在生产方面,推动建立霍山织袜厂、舒城纺织厂等妇女生产机构,但受限于经费难以为继;在宣传方面,制发漫画、手册,创办《妇女月刊》《新女性》旬刊,并借“三八”节等节点组织宣传;在慰劳与抗属服务方面,响应征募寒衣号召,组织前线慰劳队,督导岳西妇女抗助耕抗属田地、立煌妇抗发放“优待抗属证”、桐城妇抗设立抗属服务处^{[5]308}。上述举措以组织化动员提升妇女抗战参与度,但因资源匮乏,部分工作实效受限。

综上所述,安徽省动委会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后勤保障、富有成效的宣传鼓动、不可或缺的情报辅助以及开创性的妇女动员,将“民众总动员”的口号转化为具体的战时实践。这些工作相互支撑,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有效地将安徽的人力、物力、民心凝聚到抗战洪流之中,为支撑安徽乃至华中地区的持久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展现了在民族危亡关头,社会组织所能迸发出的巨大能量。然而,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初期国共合作的氛围和进步力量的主导作用。

四、安徽省动委会的改组及其影响

安徽省动委会的改组,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中央与新桂系在安徽强化政治控制、压制异己力量的集中体现。这一过程深刻反映了战时国共关系的恶化与新桂系地方统治策略的调整,标志着动员工作从服务于全民族抗战到服务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根本转向。

改组之原因错综复杂,核心在于政治转向与权力博弈。首先,动委会改组的深层根源在于国民党整体政策的战略转变。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为关键节点,蒋介石提出整饬党纪党德以克服懒惰、虚伪、散漫和迟滞,会后秘密下发《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标志着政策重心从国共合作抗日转向积极反共^{[6]294-295}。这一转变在地方层面迅速发酵。新桂系虽在抗战初期借助中共力量以抗衡蒋介石、经营安徽,但其本质奉行“外联内防”策略。随着国民党中央反共方针明确化,新桂系亦加紧在广西和安徽排挤中共力量,如1937年以“托派”罪名处决中共柳州支部书记陶保桓,1938年破坏多个中共县委。国民党中央的“反共”政策为地方实力派提供了合法性外衣,新桂系则借此清除异己、巩固

统治基础。其次,安徽省领导权的更迭直接触发了对动委会的整肃。廖磊取代张义纯出任省主席,是新桂系内部权力洗牌的结果。廖磊因忠诚度更受白崇禧信任,且与引发皖人强烈不满的“杨效春冤案”无关,得以主政安徽。廖磊上台后,视中共力量深入的动委会为心腹之患。动委会在抗战初期深入基层,通过工作团以墙报、话剧等形式有效动员民众,甚至被百姓误认为新四军的下属机构。廖磊主政标志着新桂系决心将安徽彻底“广西化”,而清除动委会中的进步力量,正是建立党政军一元化统治的关键一步。同时,1938年底日军对大别山区的压力减轻,新桂系获得喘息之机,得以将重心从军事防御转向内部政治整合,为改组提供了客观条件。

改组经历了从廖磊控权整肃到李品仙摧毁重构的过程。廖磊时期的改组以控权为核心。他首先在理论上确立“动员辅助行政”原则,在1938年11月的联席会议上宣称“动委会要帮助政府推行法令……没有权力指挥政府”^{[7]61-62},彻底否定动委会原有的独立性。他提出的“十大任务”如健全保甲、组训民众、协助征兵等,实质是将动委会改造为行政附庸。其次,通过大规模人事清洗清除进步力量,如章乃器辞去秘书,沈子修、光明甫被撤换部长职务,朱蕴山被迫辞职,周新民被调离安徽,童汉璋等人投奔新四军。广西籍亲信张威遐、蔡灏等则被安插进核心岗位。最后,建立制度强化控制。推行县长、区长、乡镇长兼任各级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制度,召开联席会议统一思想,要求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政治原则,并建立视察制度监控基层。廖磊的改组虽削弱了进步力量,但尚未完全摧毁动委会框架,其重点在于置换领导层和转变职能定位。李品仙继任后,改组升级为系统性摧毁。他抨击廖磊无法控制中共党员,提出动委会的任务应从“抗战的民众动员”转向“建设安徽巩固政治基础”^[8]。1940年,他以动委会的组织和名称“均与中央所颁发条例多有不符”^[9]为由,依据国防最高委员会新大纲进行彻底改组:第一,取消区、乡镇级动委会,仅保留省、县两级,将组织触角从基层抽离。第二,实施“集中训调”,强制解散所有工作团,将包括指导员、团员在内的1246人集中受训。此举实为清洗筛选中共和进步分子,导致3000余人被迫转移至新四军根据地^{[5]389}。第三,废除指导员制度,改由国民党省党部派遣“督导员”(均为国民党执委)直接控制各县动委会,并将民众团体统归国民党

党部领导,动委会彻底沦为国民党的“准行政机构”。李品仙的改组通过制度肢解、人员清洗和政党接管,使动委会名存实亡,其集中调训更是釜底抽薪,彻底瓦解了原有动员网络。

改组导致动员异化与基层溃散,改组后的动委会在职能与性质上发生根本异化。形式上,业务范围被扩展为组训、征调、救济、宣传四大类,看似更为系统,然核心任务已从激发民众抗日热情转向协助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组训工作重心是协助政府编整保甲、调查户口;征调工作突出协助推行兵役;宣传工作则是要求以国民党党部纲要为准,强调“三民主义”及完纳赋税等经济控制内容。这种“细分”实为功能窄化,动员完全沦为巩固国民党统治、服务兵役征派和赋税征收的行政工具,原有的民族动员内核被彻底抽空。更深远的影响是基层动员体系的瘫痪与溃散,区、乡镇级动委会的裁撤意味着组织末梢被斩断。李品仙的改组政令在战时环境下难以有效传达,至1940年5月,皖北40县中仍有12县毫无回音。即便收到命令,地方军政人员亦多消极敷衍,认为动员工作不是他的事,导致县分会陷于停滞与空洞。时人尖锐批评改组后“什么进步组织都没有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看不见了……没有一点抗战气息”^{[10]46}。交通阻隔、地方漠视与人才流失形成恶性循环,大量县动委会沦为多挂了一块招牌的空壳。基层的溃散不仅宣告国民党“自上而下”动员模式的破产,更使安徽民众抗日力量的组织化渠道被强行堵塞,极大削弱了敌后抗战潜力。

安徽省动委会的改组浪潮,始于国民党中央政策转向与新桂系权力巩固的双重需求,历经廖磊的控权整肃与李品仙的摧毁重构,最终以动员功能的彻底异化与基层组织的实质溃散告终。这一过程深刻揭示了战时国民党政权在民族救亡与党派私利间的根本矛盾,即当“防共”优先于抗日,民众动员便从卫国利器异化为控御工具。新桂系在安徽打造的“广西第二”梦想,最终以牺牲民众动员伟力为代价,其留下的不仅是动委会的空壳,更是抗战洪流中一道难以弥合的政治裂痕。

五、安徽省动委会的功绩、局限与镜鉴

安徽省动委会作为抗战烽火中诞生的特殊组织,其存在虽仅短短几年,却在安徽乃至华中抗战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其历史进行客观评价,需辩

证地审视其功绩、剖析其局限,并从中汲取历史的启示。

安徽省动委会的历史功绩不容忽视,集中体现在其对安徽抗战全局的支撑作用和对社会力量的整合效能上。其一,高效动员民众、有力支援前线是其最直接的贡献。在成立初期至改组前,动委会通过庞大的组织网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后勤保障工作。它成功组织了数以万计的民众参与运输队、担架队、工程队、救护队,保障了兵员、粮食、被服、弹药等战略物资向前线的输送,承担了破坏交通、修筑工事、救护伤员、慰劳军队等繁重的战时勤务,为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期间的皖北正面战场和新四军敌后游击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人力支持。其二,广泛开展宣传、激发民族意识是其深层次影响。动委会运用演讲、戏剧、歌咏、报刊、标语等多形式开展抗战宣传,其深度和广度在安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打破了广大农村地区的闭塞状态,将抗战信息和国家观念传播到最基层,极大地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营造了全民抗战的社会氛围,为持久抗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其三,组织社会力量、推动局部革新是其社会意义。动委会打破了传统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将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商人等群体初步组织进入各种抗敌协会。特别是妇女工作的开展,不仅动员了庞大的妇女力量参与抗战后勤和宣传,更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封建礼教,促进了妇女的社会参与和觉醒,具有社会进步意义。工作团在基层推动的扫盲、卫生、反对苛捐杂税、调解纠纷等工作,也带有一定的改良色彩。其四,提供合作平台、凝聚抗战合力是其特殊价值。在国共合作相对较好的初期,动委会成为容纳和协调国民党新桂系地方政权、中共地下组织、爱国知识分子、进步青年以及地方开明士绅等多种力量共同开展救亡工作的独特平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安徽的具体实践形式,为团结御侮做出了积极示范。

然而,安徽省动委会的历史局限与制约因素同样深刻,决定了其最终命运。首先,根本性局限在于其依附性与工具性。动委会并非独立的民众组织,其合法性、资源和权力高度依赖国民党地方政府,这决定了其性质本质上是官方主导下的动员机构。当新桂系的政策目标从利用进步力量转向防范清除时,动委会的进步性和活力便迅速被扼杀。它无法

超越其依附的政权基础而独立发展。其次,结构性矛盾在于其统一战线内部的张力。动委会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其内部始终存在着代表不同阶级、党派和政治诉求的力量,如新桂系官僚、CC系势力、中共地下组织、无党派进步青年等。合作的基础是脆弱的,共同抗日的目标并不能完全掩盖深层的政治分歧和权力争夺。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国共关系恶化时必然爆发,成为组织瓦解的内因。第三,运作性障碍在于其组织、经费与执行力。其组织体系虽庞大但不够严密高效,常受官僚主义和地方旧势力的掣肘。战时财政困难导致经费短缺,影响活动开展。基层执行力高度依赖工作团的热情,但缺乏制度性保障。征兵征粮等动员工作的强制性一面,也常引发民众不满和逃避。第四,致命打击在于其政治转向与暴力清洗。如前所述,国民党政策转向反共和新桂系的主动清洗,直接摧毁了动委会的进步骨干和工作团等核心力量,抽走了其灵魂,使其迅速官僚化、形式化直至消亡。这是其无法克服的外部政治环境剧变带来的灾难。

历史的镜鉴在于,安徽省动委会的兴衰为理解战时中国社会提供了深刻样本,它证明了有效的民众动员是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石,其初期成就彰显了组织起来的民众所蕴含的伟力。它揭示了民族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能够超越阶级和党派界限。但同时,它也残酷地展现了政治权力对民众自组织力量的深刻忌惮与最终控制。当民众动员的深度可能触及统治基础或威胁当权者利益时,压制往往取代了利用。安徽省动委会历史深刻反映了战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既有合作与利用,更有控制与冲突。安徽省动委会经验表明,缺乏制度保障和真正民主基础的民众动员,其成果是脆弱和不稳固的。安徽省动委会的悲剧性结局,是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其经验教训对于思考战争状态下国家治理、社会动员与政治包容的关系,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六、结束语

安徽省动委会是抗日战争洪流中在江淮大地上绽放的一朵独特而短暂的花朵,是民族危亡关头国共合作、新桂系图治与民众救亡热情共同催生的产物。它精心构建的组织网络,特别是深入基层的工作团和广泛建立的抗敌协会,在抗战初期高效地组

织了后勤支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鼓动,进行了必要的情报辅助,并开创性地动员了广大妇女,为支撑安徽乃至华中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展现了战时民众动员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也局部推动了社会力量的觉醒与组织化。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植根于国民党地方政权新桂系的依附性本质,使其无法摆脱工具性的命运。统一战线内部固有的张力,在国共关系逆转和新桂系巩固统治的优先考量下激烈爆发。旨在清除进步力量的残酷改组,彻底扼杀了其活力,使之迅速沦为官僚机构并走向消亡。安徽省动委会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抗战时期地方治理的史诗。它既谱写了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整合社会力量、共御外侮的辉煌篇章,更以悲剧性的结局揭示了战时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国民党政权对民众力量的深刻矛盾心态以及缺乏民主保障的动员的脆弱性。它的兴衰历程,为我们理解抗战时期国家与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战时效能与政治控制的复杂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历史个案,其蕴含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 [1] 荣孟源.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 [2] 李宗仁. 主席告全省民众书 [J]. 安徽政治(创刊号), 1938(1): 1-5.
- [3] 董必武. 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 [J]. 抗战文摘, 1938(1): 1-7.
- [4] 张劲夫. 张劲夫文选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 [5] 安徽省档案馆. 安徽省动委会档案史料选编 [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179-182.
- [6] 中共中央党校教研室. 中国国民党党史文献选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294-295.
- [7] 黎民兴. 一年来安徽动员工作易于展开之原因 [J]. 中原, 1940(1): 58-65.
- [8] 李品仙. 李副司令长官告动员工作同志书 [N]. 皖报, 1940-02-13(1).
- [9] 李品仙. 李副司令长官发表改组本会谈话 [N]. 皖报, 1940-02-06(1).
- [10]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 团结御侮风云录 [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6.